



還歷史一個真實—

讀《魯迅與我七十年》有感

文字工作者
蔡登山



魯迅與我七十年
周海嬰著 / 聯經 / 9105/350 元
ISBN 9570824328 / 平裝

記得胡適生前最不喜歡「我的朋友×××」之類的文章，因為身為考據家的他，深知這類文章，或為誇耀、或為沾光，有太多不可信之故也；而弔詭的是時人常常喜歡去追逐於「我的母親×××」之類的新聞，或為獵奇、或視為獨家，而認為有太多可信之也。因而「沾親者」有了挾持祖輩遺物的特權；而「帶故者」有倚重親身交往而炫示的便利。他們開始口沫橫飛、夸夸其談，哪怕弄虛作假，也沒有人表示懷疑；哪怕張冠李戴，有沒有人加以辯駁，他們為傳主製造神話與傳奇，但卻要累壞了如胡適般的考據家，不知多少光陰。當然我們也不可全盤否定這些家屬親友，因為有許多後人晚輩、門生故舊，能秉持「不為親者諱、不為賢者諱」的原則，而如實地提供一手的資料，而研究者正是透過這些珍貴的資料，再加上從傳主的文本去探求，那些在實際生活中遭受壓抑的情節和那些被深埋在心腑而無法言宣的話語。而唯有如此才能一步步地逼近傳主的心靈深處，捕捉到他們真實的生命。

周海嬰身為魯迅唯一的兒子，他在晚年寫

下了《魯迅與我七十年》，他說七十年來，他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與父親聯繫在一起的，但他本無撰寫回憶錄的念頭，「因為在大量的前輩回憶文字面前，我自知缺少這方面的資格。」然而由於「記憶的輪子卻已在不由自主地轉動起來。那些長期澱積於腦底，幾乎已被忘卻的往事，件件樁樁浮現出來，使我發現：自己這一生，確實經歷過，也聽到、看到過一些值得記錄的事。這當中，既有歡樂，也有酸辛，我為什麼不向人們坦白述說呢？這也許是我最後決心寫這本書的內心動力吧！」於是 20 萬字加上 180 幅的圖片，述說海嬰先生 70 年來蒼老的往事，有周氏兄弟的失和、家族的敗落、文壇的恩怨、父親之死、手稿風波……等等，錯綜複雜的事件交織在廣袤無垠的時空背景中。對於研究者而言，一手的史料與聽聞，常會讓人在茫茫的史海中，理出線索，找出根源，尤其是不為外人所得知的家族祕辛。雖然魯迅在世時，海嬰先生當時年紀太小，但日後他從叔叔周建人及母親許廣平的敘說中，獲取了珍貴的資料，而這些資料正足供研究者，參照佐證。然因篇幅所限，在此僅能舉出數端，以見其餘。

魯迅與周作人在「五四」文壇，被稱為「周氏兄弟」。直到抗戰之前，這個稱謂一直作為一種令人企羨的名稱而存在著。魯迅極重兄弟情誼，我們從他當年在南京讀書時所作〈別諸弟詩〉：「謀生無奈日奔馳，有弟偏教各別離。最是令人淒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可見他對兄弟深情之一般。年輕時魯迅一直充當周作人的引路人，又為支持周



作人的生活而犧牲自己的學業，提早回國謀職。周作人到北大教書，也是魯迅引薦的。北京八道灣的房子買下修好後，魯迅又把主房大院讓給周作人一家住，自己則住在前院較差的房子裡。此時兄弟的感情怡怡，他們有著驚人的一致，一樣的情感，一樣的思想，一樣的真誠……。但到了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卻這麼記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7月19日又記載：「上午啓孟自持一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當天周作人給了魯迅一封絕交信，並不理會魯迅的解釋，氣沖沖地走了。於是8月2日魯迅帶著妻子朱安遷居磚塔胡同61號，他永遠地離開了八道灣，那曾經是他辛苦建立的家園。關於兄弟失和的原因，至今雖仍是個謎，但是其遠因如歷來親友及研究者所說的，出於羽太信子的不善理家，用錢無度。而導火線雖然海嬰有「一家之言」，但總歸與舊時傳聞「失敬」、「聽窗」同屬一類，倒是晚近研究者舒蕪先生在〈憶臺靜農先生〉文中，提到臺靜農曾告訴他，兄弟失和原因，更較為可信——他說：周作人在北京西山養病時，魯迅忙於從各方面籌措醫藥費，有一次正是急需錢用的時候，魯迅替周作人賣一部書稿，稿費收到了，魯迅很高興，想著羽太信子也正著急，連夜到後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後來羽太信子對周作人說魯迅連夜進來，意圖非禮，周作人居然信了。他說，周作人的文章那麼明智，實際世事就是昏得很。」而據周作人後來說，他當天的日記，還有10個字涉及與魯迅的矛盾，但被他剪掉了。這剪掉的10個字，可能真實記錄了當時他對此事與信子毫無二致的看法，也才有絕交信中的「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願你安心，自重」云云的話語。而10個月後魯迅返回八道灣取書，遭周作人夫妻的「罵詈毆打」，而信子面對眾人還述說魯迅「罪狀」並「多穢語」（注意體悟此三字內涵）時，「凡捏造未

圓」，周作人在一旁「救正之」。面對周作人夫妻的「誤解」，不僅使魯迅極為難堪，更令他感到百口莫辯。以魯迅的性格，也只有此種「誤解」，能使他隱忍而不辯，但「背著兄弟媳婦過河」，卻導致瓜田李下之嫌，好心得不到好報，終使魯迅大病一場，前後達一個半月之久。

對於周作人，海嬰先生有諸多的憤懣，除了大都是魯迅三兄弟間留下的恩怨，還有著海嬰先生的親身感受，如八道灣房產之事，已經嚴重傷害了海嬰先生的母子，因此當我們閱讀這些情節時，應有「同情的理解」。在此想補充說明的，是兄弟失和後的一些情形，或有助於我們瞭解雙方性格的另一個側面。我們知道決裂後的兩人都避免公開談論對方，但私下的議論則時或有之。在創傷多少平復之後，魯迅私下談及周作人時，表現出他的大度、公允，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護惜之情。就如他在回答埃德加斯諾夫人，「中國最優秀的雜文作家有哪些？」的提問時，他列出的名單中居第一位的便是周作人（可惜這件事周作人生前並不知道）；周作人因〈五十自壽詩〉受到左翼文壇嚴厲抨擊時，唯有魯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給予了「同情的了解」。而在病危高熱之際，魯迅還在讀著周作人的著作，或許他還想填補因兄弟失和帶來的情感世界的真空呢？有論者指出魯迅是中國現代最複雜、最痛苦的靈魂，從某種意義上說，周作人也是。他們都是寂寞的人，也在寂寞中達成相愛相知。因此一旦失去了對方，他們各自面對的世界將更加寂寞。然而相對於魯迅，周作人在失和後就顯得冷漠矜持得多了。他偶或提及魯迅，則語多譏諷，比如給江紹原信中道：「即如『魯』公之高升為普羅首領，近又聞將刊行情書集，則幾乎喪失理性矣。」1936年魯迅去世後，他發表的文章仍保持著某種疏遠的姿態，在肯定魯迅知人論世的深刻、學術的成就及不求聞達之餘，仍不忘點明魯迅的「多疑」。



抗戰期間周作人「落水」成爲漢奸，解放後他被保釋出獄，再度回到八道灣，雖有棲身之地，但他的家產已被沒收，他只能賣文爲生。於是在《亦報》上大寫起有關魯迅的文章，後來結集起來以周遐壽的名字出版了《魯迅的故家》和《魯迅小說裡的人物》兩本書。直到1956年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時，他還寫了不少有關文章，後來以周啓明的名字出版了《魯迅的青年時代》。從魯迅逝世時，他只馬馬虎虎寫過兩篇文章，就拒絕別人的約稿，並說是以他的身份，是不便於寫此類文章的，到晚年爲生活所迫，他大寫特寫。這種附驥於魯迅的作法，難免貽世人之譏。難怪許廣平就諷刺他，當初罵魯迅，現在吃魯迅。而即使如此，他又絕不承認他當年對待兄長的錯誤行爲。我們看他晚年的《知堂回想錄》和他給友人曹聚仁、鮑耀明的信件中，知道他對當年的事，一直耿耿於懷，說不辯解，而實多方辯解。這一如他連落水做漢奸，這樣的大錯，也要曲爲之辯。這不能不說周作人這一生中，兩件最教人遺憾的事。在這方面，他欠缺懺悔意識，更無法直面人生的。

對於魯迅與創造社的恩怨，後人多不明究裡。周海嬰書中提到，母親許廣平對創造社的成仿吾，後來在1959年接受蘇聯漢學家彼德羅夫訪問時說：「我們對魯迅不滿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我們皆拋離廣東，而魯迅卻前往廣東，他是被朱家驊利用，做了廣東大學的教務長，這是他落後處。直到他後來發覺，才回上海。」這種篡改歷史，有意誣衊魯迅的做法，當年就曾予以嚴重的駁斥。對於創造社，其實魯迅早在1926年11月7日給許廣平的信就說：「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可惜的是，魯迅在次年一月到廣州任中山大學系主任兼教務長時，當時創造社成員大都星散。4月15日廣州大屠殺，魯迅營救被捕學生無效後，即向校方辭

職。這絕非是成仿吾所說的，在大革命失敗之後，才任教務長的。而當魯迅於10月3日從廣州回到上海不久，創造社元老鄭伯奇等人，在11月9日及19日兩次拜訪魯迅，談到聯合作戰事，並商議共同恢復《創造週報》，提倡革命文學。而這件事，對早在十月上旬就赴日本，邀請馮乃超、朱鏡我、李初梨、彭康、李鐵聲五位「新銳的鬥士」回國，重振創造社雄風的成仿吾而言，是並不知情的。而先後在10月下旬及11月上旬回上海的馮乃超諸人，雖然知情，但在郭沫若11月上旬回滬與他們溝通後，他們並不採納鄭伯奇之提議。於是郭沫若乃電催成仿吾回滬商議，以作出定奪。12月上旬成仿吾回到上海，經過一番磋商，據郭沫若指出當時成仿吾的態度是，「他堅決反對《創造週報》的復活，認爲《週報》的使命已經過去了，支持回國朋友的建議，要出版戰鬥性月刊，名叫《抗洪》（後來這個名字沒有用，是改爲《文化批判》）。對於和魯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因此研究者衛公在〈魯迅與與創造社關於「革命文學」論爭始末〉一文中，作出推論說：「郭沫若爲了防止創造社的分裂，先做了退讓，同意照著成仿吾他們所樂意的計劃進行。鄭伯奇也讓步了，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沒有向魯迅作妥善的安排和交待，就這樣有頭無尾的放棄了聯合魯迅的計劃。這實質上是犧牲了創造社與魯迅的團結而求創造社內部的團結，只顧防止內部的分裂而不顧聯合戰線的破裂。」又說：「聯合魯迅一事無形取消；原因也非什麼『編輯上的關係』，而是剛回國的人們的激烈反對（似乎主要取決於成仿吾與朱鏡我兩人的態度）。」海嬰先生道出事隔三、四十年後，李初梨等人還在大罵魯迅，甚至指責許廣平，正爲這段恩怨，提出珍貴的歷史佐證。海嬰先生在〈父親的死〉中的〈一個長埋於心底的謎〉一節，提到魯迅死於日本軍醫須藤誤診之說，雖然那已不是個新的說法。早在1949年周建人已在《人民日報》寫過〈魯



迅的病疑被須藤醫生所耽誤〉的文章，而到了1984年，紀維周、蔡瓊等更為文支持這個論點。只是也因此而引發日本人的施壓，當時北京方面，在不妨礙中日邦交的狀況下，自身模糊焦點。使得日本方面，做出〈魯迅兒子周氏否定魯迅之死與日本原軍醫有關的論點〉及〈魯迅死因之謎的論爭可以終止了〉等報導，完全撇清這事件。也因此20年來，無人再提此事，歷史的真相就這樣被掩蓋了。所幸海嬰先生終於在17年後，再提出這個長埋心底的真相。有關此事件的來龍去脈，筆者已在另文闡述過，在此不多費筆墨。唯對王元化先生在本書序文中提到，「另外魯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後，為什麼堅持不換醫生，這也是一件懸案」及「須藤醫生曾建議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魯迅〈拒絕了〉」（案此或是根據海嬰先生之說法），兩件事提出個人的看法及事實的真相。

我們知道魯迅是在日本學醫的，只是後來「棄醫從文」。他曾和醫學教授藤野嚴九郎，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我們從魯迅寫於1926年的〈藤野先生〉一文，可見一斑。也因此魯迅對於日本醫生有特別的偏好，我們從《魯迅日記》中查得，在北京時期有池田由友及山本忠孝兩位日本醫生。而在上海的10年中，魯迅、許廣平、周海嬰看過的日本醫生分別有：婦產科醫師久米治彥、高山章三、菅又吉，外科醫師頓宮寬（福民醫院院長）、岡本繁、吉田篤二，內科醫師秋田康世、松井勝冬，小兒科醫師坪井芳治（周海嬰的義務主治醫師）、樋口良平，耳鼻喉科醫師濱之上信隆，牙科醫師奧田杏花，還有兼看耳鼻喉科、內科、小兒科的石井政吉和診治各科，也是魯迅晚年的主治醫師的須藤五百三。而1936年6月15日，魯迅根據松井醫師的指示，曾在上海福民醫院做「胸部X光」照。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在魯迅病情急遽惡化之際，在須藤醫師的委託下，石井政吉和松井勝冬曾一起會診。這在魯迅的日本好友，當時在上海開「內山書

店」的內山完造的〈憶魯迅先生〉文中亦有提及。總之，魯迅與日本醫師是比其他人多一層感情因素，他們很容易成為好友。例如石井政吉就是內山書店以魯迅為中心的談話會（文藝漫談會）的一員，《魯迅日記》中多有記載；而奧田杏花和魯迅更有十年的交往情誼，魯迅逝世時，就是他為魯迅製作了面膜石膏像。另外像增田忠達，更是日本漢學專家、魯迅研究者，增田涉（案：海嬰先生在書中第122頁還附有他和增田涉的合照）的父親。試想如此狀況下，魯迅在沒有實際證據下，會無緣無故換掉醫生嗎？

至於到日本養病一事，魯迅原是有考慮去的。據友人黃源在〈魯迅先生〉一文中說：「那時天氣漸漸熱起來，他本想7、8、9（按：指1936年）3個月往日本去養病。起初想到鎌倉，那裡須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纏。後來想到長崎，有一天我去，看見書桌上放著兩本《長崎旅行案內》之類旅行指南書。但長崎沒有熟人，他覺得住HOTEL太貴，住『下宿』或租『貸家』又太麻煩。『那時我要一天到晚給他們（指家裡的人）當翻譯了。』他說。」而魯迅在同年8月2日給茅盾的信也說：「醫師已許我隨意離開上海。但所住之處，則尚未定。先曾決赴日本，昨忽想及，獨往大家不放心，如攜家族同去，則一履彼國，我即化為翻譯，比在上海還要煩忙，如何休養？因此赴日之意，又復動搖，唯另覓一能日語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意如何，尚在考慮中也。」到8月16日魯迅給茅盾的信，還有「轉地實為必要，至少，換換空氣，也是好的。」的字眼，只是由肋膜及咳血之故，而有所改變。他在8月31日給茅盾的信就說：「我肺部已無大患，而肋膜還扯麻煩，未能停藥；天氣已經秋涼，山上海濱，反易傷風，今年的『轉地療養』恐怕『轉』不成了。」因此海嬰先生的轉述「記得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



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的話，似乎是根據魯迅在9月18日給許杰的信中「我並沒有預備到日本去休養；但日本報上，忽然說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國報上如亦登載，那一定從日本報上抄來的」。魯迅當時有如此決然的口吻，是基於當時中日關係越來越緊張，日本即將成為「全民公敵」，他此時焉有赴日就醫之理呢？加上面對國內一些文壇小醜的無端攻擊、毀謗，他要戰鬥下去，因此他留在上海，這在他死前的4天給臺靜農的信，可見一斑。因此他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他拿起「匕首」、「投槍」，也就是他所說的「輕傷不下火線！」。除此而外，好友許壽裳則認為「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請D醫開刀，大病後之所以不轉地療養，『何時行與何處去』，始終躊躇著，多半是為了這經濟的壓迫」，因為當時魯迅的經濟來源，只靠版稅和稿費，而「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購買印行圖書等費，盡

出於此。但是版稅苦於收不起，賣稿也很費力」。

於是我們看到魯迅一面與死神搏鬥，一面卻緊握手中之筆，寫下〈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個師父〉、〈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以及七則〈立此存照〉……。死的預感，沒給魯迅萬念俱灰，卻更添活力，這也是他一貫「反抗絕望」的精神。在病情略有轉機的深夜，魯迅感覺到：「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裡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欲望」，臨終前魯迅的身影，是熱愛人間的，那是歷史的真實！

ISBN



稿約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刊載與圖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為主。內容包括報導臺灣地區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新書介紹、書評、專題選目、作家與作品、出版人專訪以及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園地開放，歡迎賜稿。

1. 賜稿以未經發表者為原則，文長不超過五千字為宜。
2. 請提供 WORD 文字檔之電腦磁片或書面稿；凡經賜稿，不論刊登與否，恕不退件。
3. 來稿如涉及著作權或其他文責問題，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4. 其他刊物或個人如需轉載本刊文章，需徵得作者及本刊之同意。
5. 本刊編輯有審稿及修改權，如有不同意見，請在來稿時聲明。
6. 來稿經刊出後，依政府相關規定致贈稿酬，此項稿酬已包括各種型式發行之報酬，本刊不再給予其他酬勞。
7. 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現在服務單位、職稱、身分證字號、戶籍所在地址、電話、傳真、E-MAIL 或作品發表時使用之筆名。
8. 本刊內容並將以電子型式發表於國家圖書館網站上，不願意於網上發表者，請特別註明。網址為：<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
9. 賜稿請寄：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編輯部收，或 E-MAIL：newbooks@msg.ncl.edu.tw
10. 聯絡電話：(02)2361-9132 轉 705；傳真：(02) 2311-5330